

“欲为强毅之国民”

——20世纪前期军国民教育的思想与实践

杨雨青 许颖轩

【摘要】军国民教育思想形成于近代中国一再屈辱战败的历史背景下。作为军国民教育最早的提出者和倡导者，留日学生蔡锷和蒋百里在《新民丛报》上大力宣扬军国民教育思想。在军国民教育思想的影响下，留日学生开始自发组织军事训练，其后清政府和北洋政府也有意在现代学校的教育中尝试和推广兵式操等军事训练项目。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公理战胜强权”成为国人基本共识，军国民教育一度受到排斥，直至济南惨案爆发才再度为世人重视。20世纪前期军国民教育的上述发展历程值得深入探讨。

【关键词】清末民初 军国民教育 兵式操 国际形势

【作者简介】杨雨青，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许颖轩，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K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 - 1125 (2024) 09 - 0112 - 14

20世纪前期，军国民教育思想由中国留日学生蔡锷、蒋百里首倡，继而风靡整个留日知识界，并迅速流播扩散至上海等地，得到国内不同阶层的赞成与支持，一度成为体现不同政治派别共识的社会政治思潮。^①国内学界关于军国民教育的研究热度一度较高。多数学者赞同军国民教育经历了产

^① 参见董林亭：《中国近代军国民主义思潮成因述论》，《邯郸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第32页。

生—兴盛—衰落三个阶段。^①董林亭指出，“军国民主义”思潮的兴起与蔡锷、蒋百里等留日学生的大声疾呼，以及“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宣传家梁启超呼风唤雨式的运作是分不开的”，而“清政府对军国民主义思潮的勃兴，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②徐方平认为，空前的民族危机加深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军国民教育的认识，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责任是军国民教育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军国民教育思想形成的理论依据，而近代国际局势，尤其是德国和日本两个军事强国的崛起则对军国民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③自1902年蔡锷正式提出“军国民”的概念，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军国民教育的起起落落，军国民教育在中国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学界过往对军国民教育的研究多集中在思想成因、人物观念及其与体育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对其实践则较少涉及。^④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力图系统回顾军国民教育思想及实践的发展历程，梳理其逻辑和脉络，总结其阶段性特征。

一、20世纪初的军国民教育思想

（一）军国民教育思想之缘起

军国民教育思想的提出与近代中国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紧密相关。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列强不断侵略中国，清军几乎屡战屡败，割地、赔款成为近代中国历史抹不去的印记。早在鸦片战争前，清军就已暴露出兵员素质低下的问题，士兵不仅“疏于训练，兵不习战，罔知炮法，一旦有急，拱手就戮”，^⑤而且不少人染上吸食鸦片等恶习。面对外部强敌环伺、内部武

① 参见韩玉霞：《清末民初的军国民教育》，《史学月刊》1987年第5期，第41~43页；向常水：《清末民初湖南的军国民教育思潮》，《湖湘论坛》2001年第2期，第82~83页。

② 参见董林亭：《中国近代军国民主义思潮成因述论》，《邯郸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第33~35页。

③ 参见徐方平：《清末民初军国民教育思想成因探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第95~96页。

④ 参见林儒、袁海军：《军国民教育思想下近代中国身体教育的主张与实践》，《体育与科学》2012年第1期，第111、115~117页；孙绪闻、费志杰：《浅谈清末民初军国民教育的变迁》，《海军工程大学学报》（综合版）2016年第2期，第40~44页；杨辉：《近代军国民教育思想改造学生身体的实践》，《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121~128页；蔡峰、张建华、张健等：《蔡元培对近代学校武术教育的影响》，《体育科学研究》2018年第1期，第41~45页。

⑤ 史全生主编：《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东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备废弛的局面，林则徐、魏源等主张向西方学习，既要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也要学习养兵、练兵之法。^①不过，相关建议在一开始并未被清朝统治者采纳。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清政府仿照西方国家为军队陆续配备新式武器，开办陆军、海军新式军事学堂，并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军事思想。然而，随着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洋务运动宣告破产，空前的民族危机迫使人们深入反思国家与民族的命运。这时，留日学生注意到军国民主义对日本迅速崛起的刺激作用，并开始意识到国民身体素质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国力的强弱，亦即国民尚武对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②

在重文轻武传统的影响下，当时中国民众的身体素质普遍较低，青年学生文弱无力的情况更是比比皆是，“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搏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③面对此等国贫民弱的情况，维新派在主张变法的同时，也曾呼吁学习东西各国尚武之精神。例如，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中指出，“泰西争雄，皆以民为兵”。^④此外，康有为还在《大同书》中首次提出将军事教育融入普通学校教育：

大学亦重体操，以行血气而强筋骸……大学衣服皆同式，饮食皆同时，人数万千，部署整肃，当若军法。自食堂至讲堂、操场，进退出入皆有部伍；有大师为司理人，统之如将帅，分教如偏裨，小分教如队长。大同之世，每一院如一小国，学者即其人民，教习司理即其公、卿、士夫也。^⑤

这一观点颇具前瞻性，虽在当时未能引起广泛的社会影响，但作为一种思想的萌芽，它不仅在客观上促进了军国民教育思想的形成，而且为后来在普通学校教育中增设军事训练项目奠定了基础。

（二）军国民教育概念的提出

军国民教育思想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积极探索救亡之路的一种思想主张。从其诞生伊始，军国民教育思想便将“军”与“国民”两种行为主体

① 参见史全生主编：《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东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10页。

② 参见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895页。

③ 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99页。

④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1895年5月2日）》，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2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

⑤ 康有为著，邝柏林选注：《大同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6页。

相结合，注重从孩童时期起培养国人的“军国民”资格，在学校和社会中推行军国民教育。

1902年2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新民丛报》正式发刊。这一时期的《新民丛报》堪称近代中国军国民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阵地，下述《军国民篇》《军国民之教育》《新民说·论尚武》均刊登于《新民丛报》。

1902年，时年仅20岁的留日学生蔡锷在《新民丛报》创刊号上发表文章《军国民篇》。在该文中，蔡锷以“奋翻生”为笔名，首次提出军国民这一概念，将之解释为“军者，国民之负债也。军人之智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领，不独限之从戎者，凡全国民皆宜具有之”。蔡锷主张培养具有“国魂”的国民，对国民进行军事训练，并以欧洲为例，大力提倡在中国推行军国民主义：

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军国民主义，昔滥觞于希腊之斯巴达，汪洋于近世诸大强国。欧西人士，即妇孺之脑质中，亦莫不深受此义。盖其国家以此为全国国民之普通教育，国民以奉斯主义为终身莫大之义务。^①

《军国民篇》于《新民丛报》连载数期，^②开风气之先。有论者认为，“吾国之军国民主义之输入，以此为嚆矢”。^③

同年，新民丛报社鉴于“其关系于国民精神重且大”，将留日学生蒋百里的译文《军国民之教育》刊登在该刊第22号上。《军国民之教育》开篇即论及国民与战争的关系，凸显了国防对普通国民的特殊意义：“军务者，国民之负债也。国防者，国民之义务也。今日之战争，国民全体之战争，而非一人一姓之战争也。其胜也，国民享其利。其败也，国民受其祸。”在此基础上，该文认为军人的精神对国家与国民而言至关重要，“军人形质之在于外者，国家赖之以安宁。军人精神之在于内者，则国之所由立也，民之所由生也。”该文还主张按照军事标准加强国家组织的管理与国民精神的建设，“凡社会上一切之组织，皆当以军事的法律布置之。凡国防上一切之机关，皆当以军事的眼光建设之。社会之精神之风俗之习惯，皆当以军人之精神贯注之”，如此方能达成“军人耶，国民耶，则一而已矣”的目标。该文同时认为，“所谓振社会之风纪者”，“其一曰使社会之风纪一趋于勤苦也……欲

^① 参见奋翻生（蔡锷）：《军国民篇》，《新民丛报》1902年第1号，第80页。

^② 《军国民篇》在《新民丛报》1902年第1、3、7、11号“兵事”栏目上连载。

^③ 赵式铭、郭燮熙、刘润畴：《蔡松坡先生事略》，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49页。

为强毅之国民乎，则先自勤苦，始立今日之世界……其二曰使社会之风纪一趋于尚武也……按将来之政策，国家，一军队也”。该文最后强调，“善战者兴，不畏战者存，惟畏战而不知战者，乃当战祸，乃亡其种”，因此亟须开展军国民教育，“军国民欤！盖归乎来以扬我祖国荣光”。^① 尽管蒋百里并非《军国民之教育》的原作者，但通过文中附注的“译者曰”的内容，可知蒋氏高度认同该文的观点与理念。由此，军国民教育这一提法便被正式确定了下来。

1903年3月，梁启超在《新民说》中专门列出一节“论尚武”，极力强调国民尚武对国家的关键意义：“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吾望我同胞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无奄然颓惫以坐废也！”他将中国“武事废堕，民气柔靡”的原因归于重文轻武的传统，主张效法斯巴达、德国、俄罗斯、日本的尚武教育。梁启超审视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慨叹“今日群盗入室，白刃环门，我不一易其文弱之旧习，奋其勇力，以固其国防，则立羸羊于群虎之间，更何术以免其吞噬也？呜呼！甲午以来，一败再败，形见势绌，外人咸以无战斗力轻我矣”。他还指出，“惟能战者乃能和”，只有国民尚武、国家武力强大，才能抵御侵略，“柔弱之文明，卒不能抵野蛮之武力。然则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持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② 1904年，梁启超又撰写《中国之武士道》一书，期望唤起国人的尚武精神，使之不再苟且偷安、混沌度日。在该书中，梁启超寓史实于政论，介绍了从春秋战国至汉初的70余位以武德名扬天下的历史人物，以尚武思想贯穿其中，激赏“常以国家名誉为重，有损于国家名誉者，刻不能忍”，“国际交涉，有损于国家权利者，以死生争之，不畏强御”，“苟杀其身而有益于国家者，必趋死无吝无畏”，“战败宁死不为俘”^③ 等精神。通过对这些历史人物勇武救国事迹的颂扬，梁启超强调“中国民族”素有尚武精神，只是囿于“时势”“地势”“人力”而为人忽略。^④

在康有为、蔡锷、蒋百里、梁启超持续不断的努力下，军国民教育思想成为当时颇具影响的思潮之一，国民强健身体的要求从此与国家的兴衰、民

① 参见百里（蒋百里）：《军国民之教育》，《新民丛报》1902年第22号，第33~35、48、51~52页。

② 参见梁启超：《新民说·论尚武》，《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090~5100页。

③ 参见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自叙》，《饮冰室合集》专集第6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867~5868页。

④ 参见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自叙》，《饮冰室合集》专集第6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865页。

族的命运紧密相联。值得注意的是，军国民教育思想不仅重视培养国民军人般的体魄与行为举止，还在思想意识层面提出服膺军人精神等要求，这使其内涵更加丰富。

二、辛亥革命前夕军国民教育的实践

（一）“各堂兼习兵学”——清末新政中的尚武教育

在清末民初，社会各界普遍认为重文轻武教育是导致国家积弱的原因之一。^① 1901年，清政府发布上谕，试图通过推行新政挽救其统治，在新政的内容中，便包括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在各省设立武备学堂，编练新军；在各大主要城市设立军事学堂；将全国各地书院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鼓励出国留学，对学成归国者委以重任。同年，时任南洋公学总教习的蔡元培率先在南洋公学开设兵式体操课程。^② 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制定《钦定学堂章程》，要求各级学堂开设兵式体操课程。^③ 该章程虽未能施行，但为后来的《奏定学堂章程》做了铺垫。

1903年，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在《学务纲要》中提出“各堂兼习兵学”，认为“中国素习，士不知兵，积弱之由，良非无故。揆诸三代学校兼习射御之义，实有不合。除京师应设海陆军大学堂，各省应设高等普通专门各武学堂外……兹于各学堂一体练习兵式体操以肄武事，并于文高等学堂中讲授军制、战史、战术等要义”，^④ 高度重视各级学堂的军事教育与训练。对私人学堂，张百熙等则强调“禁专习政治法律”“禁私习兵操”，要求“凡民间私设学堂，非经禀准，不得教授兵式体操。其准习兵操者，亦止准用木枪，不得用真枪以示限制”。^⑤

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在各级各类学堂开设“体操科”。这一时期的“体操科”以日本学校的体操课为范本，以兵式操为主

① 参见揭春雁：《民国时期的大学军训》，《教育》2013年第23期，第58页。

② 参见孙绪闻、费志杰：《浅谈清末民初军国民教育的变迁》，《海军工程大学学报》（综合版）2016年第2期，第42页。

③ 参见张百熙：《张百熙集》，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76~134页。

④ 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学务纲要〔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210页。

⑤ 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学务纲要〔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206页。

要教学内容，教师多由军人或武备人员担任。^①同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2册中，有一篇课文生动描绘了学生习练兵式操的场景：“好男儿，志气高。哥哥弟弟手相招，来学兵队操。小兵护短枪，大将握长刀。龙旗向日飘，铜鼓冬冬敲。”^②

1906年，学部奏请清政府宣示教育宗旨，认为“东西各国，全国皆兵；自元首之子以至庶人，皆有当兵之义务，与我中国天子元子齿于太学之义亦相符合……今朝廷锐意武备，以练兵为第一要务，然欲薄海之民咸知捐一生以赴万死，则尤恐不能深恃者何也，饷糈之心厚而忠义之气薄，性命之虑重而国家之念轻也。欲救其弊，必以教育为挽回风气之具，凡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俾儿童熟见而习闻之”，要求设立“体操一科，幼稚者以游戏体操发育其身体，稍长者以兵式体操严整其纪律，而尤时时助以守秩序，养威重，以造成完全之人格”。清政府在上谕中认可学部的奏请，并指出“人人有振武之精神，而自强可恃”。同年，清政府正式颁布“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③把尚武教育正式列入其中，进一步确立了军国民教育作为清末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

（二）“拒俄义勇队”与“军国民教育会”——留日学生的自发军事训练

在《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④1902年4月，中俄两国在北京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条约规定“俄国交还东三省给中国”。^⑤然而，直至1903年4月，俄国仍未如期从中国东北撤兵，甚至向清政府提出七项继续撤兵的新条件，妄图长期霸占中国东北，此举令广大留日学生无比愤慨。1903年4月29日，在东京的留日学生决定组织“拒俄义勇队”（以下简称义勇队），这标志着留日学生开

① 参见林儒、袁海军：《军国民教育思想下近代中国身体教育的主张与实践》，《体育与科学》2012年第1期，第117页。

② 参见陈景磐编：《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85页；郎净：《晚清新政时期学校体育研究：以学制和教科书为参考对象》，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87页。

③ 参见《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 [光绪三十二年 (1906)]》，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220、222页。

④ 孙中山：《建国方略（一九一七年—一九一九年）》，《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08页。

⑤ 参见张海鹏、李细珠：《中国近代通史》第5卷《新政、立宪和辛亥革命（1901—1912）》，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7页。

始自发进行军事训练。

1903年5月初，留日学生制定义勇队规则，推举陆军士官学生蓝天蔚为义勇队队长，并将义勇队定名为“学生军”。学生军下编三个区队，每个区队分为四个小队，每小队约10人。在“宁为亡国鬼，不为亡国人”的口号感召下，学生军派钮永建、汤尔和作为代表回国，向清政府请愿出兵抗俄。^① 尽管学生军的活动均在清政府允许的范围之内，但在接到留日学生王璟芳所谓“名为拒俄，实为革命”的诬告后，清驻日公使蔡钧仍致电两江总督端方称：“东京留学生结义勇队，计有二百余人，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现已奔赴内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② 清政府于是密谕地方各督抚：“东京留学生已尽化为革命党，不可不加之防备……此间革命党近业已组成军队，托于拒俄一事，分奔各地。”^③ 清驻日留学生监督汪大燮随即责令学生军停止活动，蔡钧“又请日本政府出面勒令解散义勇队，制止留学生练习兵操”。^④ 在清政府和日本政府的强制干预下，学生军迅即被迫解散。

在学生军解散的次日，叶澜、秦毓鎏等“联合队员中之宗旨坚定者”将学生军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⑤ 随后又议定军国民教育会规则，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为根本宗旨，^⑥ 规定“各校功课之外，多习体操射击战术诸科，以待效死而已”。^⑦ 军国民教育会的会员“进行军事训练的课程分为射击部、体操部、讲习部三部”，会员们还约定于“每周六到东京的九段坂体育会学习步枪射击”。自1903年5月18日起，各项军事训练科目陆续开展，会员们刻苦训练，以期“养成军国民资格”。^⑧ 军国民教育会与上海的同名组织遥相呼应，使军国民教育思想在全国广为传播。^⑨

1903年7月，部分激进的会员将军国民教育会的宗旨改为“养成尚武

① 参见史全生主编：《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东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页。

② 参见史全生主编：《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东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35~136页；《蔡钧致端方电》，《苏报》1903年6月5日。

③ 《密谕严拿留学生》，《苏报》1903年6月5日。

④ 史全生主编：《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东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6页。

⑤ 参见史全生主编：《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东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6页。

⑥ 参见《记军国民教育会》，《浙江潮》（东京）1903年第5期，第147页。

⑦ 军国民教育会：《军国民教育会纪事》，1903年自印本，第33页。

⑧ 参见史全生主编：《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东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页。

⑨ 参见孙绪闻、费志杰：《浅谈清末民初军国民教育的变迁》，《海军工程大学学报》（综合版）2016年第2期，第41页。

精神，实行民族主义”，与之相应的活动方式则主要有三种：“一曰鼓吹，二曰起义，三曰暗杀。”^①此后，军国民教育会这一由留日学生自发成立的军事训练组织，以尚武和救国为核心主张，逐渐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

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代之以新式学堂教育，其原本意在通过培养具有新学背景的学生来挽救其危机四伏的统治，孰料竟作茧自缚。在清末新政和日俄战争的直接推动下，推崇军事训练的留学生群体及深受前者影响的新军军官群体最终成为推翻清政府的“掘墓人”。对此，蒋复璁曾回忆道：

当时大家都认为革命是大势所趋，因为外患的兴起、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无非是满清官僚腐败无能，昧于外事所致，要国家富强，非先革命不可。学生这样想，朝廷练的新军也都这样想。新军军官的来源与留学生关系密切，高级军官多为留学生出身，低级军官则来自陆军小学、陆军中学或者速成军官学堂等学生，都是留学生训练的。^②

总之，清末军国民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直接推动了相关实践——内有清廷尚武教育宗旨和学校军事训练方法的颁布，外有留日学生“拒俄义勇队”与“军国民教育会”的成立。这不仅改变了清政府的旧式教育模式，而且影响了中华民国初期的学校教育，以制度化的形式凸显了军事教育的特殊地位。

三、中华民国初期的军国民教育实践

（一）北洋政府时期的军国民教育

蔡元培是首位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③观点的教育思想家。1912年，蔡元培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主张五育并举，认为中国应推行军国民教育，“军国民、实利两主义，所以补自卫自存之力之不足”，并提出在教学内容方面，“军国民主义当占

① 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1~112页。

② 蒋复璁等口述，黄克武编撰：《蒋复璁口述回忆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版，第22页。

③ 周菊芳编著：《学界泰斗 人世楷模——蔡元培》，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7页。

百分之十”。^① 1912年1月，在蔡元培的主导下，《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颁布，其中明确规定：“高等小学以上体操科应注意兵操。”^② 在此基础上，民国教育部于同年9月2日公布教育宗旨，要求“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③ 足见军国民教育受到高度重视。与此同时，许多学校通过组织“少年义勇团”或“童子军”来培养学生的尚武精神与军事技能。^④ 在童子军的军歌中，即多有体现军国民教育精神的内容：

二十世纪地行星，皇皇童子军。小锣小鼓号，飘飘飞舞小旗旌（民初改为五色飘舞小旗旌）。哥哥华盛顿，弟弟拿破仑。心肝虽小血自热，头颅虽小胆不惊。进行进行，小人小马武装神。二十世纪天演争，安能存？脚踏五大洲，气吞两半球，将军飞将军，谁云孺子不知兵？爱吾国兮如身，爱吾群兮如亲。万岁万万岁，伟此吾军人！^⑤

1915年1月，袁世凯发布《颁定教育要旨》，称“本大总统既以兴学为立国要图，今兵气渐销，邦基粗定，提倡斯旨，岂容踌躇……使中华民族为大仁、大智、大勇之国民，则必于忠孝节义植其基，于智识技能求其闾，尚武以备军人资格”，要求国民尚武以“卫身”“卫国”。^⑥ 同年2月，袁世凯又颁布《特定教育纲要》，“申明教育宗旨，注重道德、实利、尚武，并运之以实用以命令颁布”，强调“现时教育最大之缺点有四”，其中之一便是“无尚武精神”，要求尚武教育“以自初等小学注重体育卫生，加以军队束伍进退之法为始”。^⑦

不难发现，民国初期的军国民教育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延续了清末的发展趋势，依然享有崇高地位。当政者希望通过军事教育提升国防实力，增强国民身体素质，改善国民精神面貌。不过，针对军国民主义可能存在的弊端，也有人提出质疑，主张以道德来约束军国民主义的极端倾向，其文曰：

① 参见蔡元培：《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1912年4月）》，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024~1025页。

② 陈景磐编：《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85页。

③ 《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1912年9月2日）》，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223页。

④ 参见陈景磐编：《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85页。

⑤ 陈景磐编：《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85页。

⑥ 参见袁世凯：《颁定教育要旨（1915年1月）》，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245、247页。

⑦ 参见袁世凯：《特定教育纲要（1915年2月）》，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255页。

“军国民主义之不可以离道德，则更显见，我国从前有‘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之语，现在军队，时生事端，何尝非尚武之人，由无道德心以裁制之故耳。”^①

国际局势的变化对近代中国的教育思想乃至学制亦产生了重大影响，就中国的军国民教育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实为其发展的转折点。1914年11月，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范源廉在《今日世界大战中之我国教育》中强调，国人要“振尚武之精神”，“执干戈以卫社稷，正吾辈人人之义务也”，^②可见彼时军国民教育在国内仍然得到认可和接受。然而，在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的战败使军国民教育的风评急转直下，中国教育界开始排斥和否定军国民教育。例如，蔡元培对军国民教育的认识便发生了变化：“德之军国民主义，以全国人民为机械，而供野心家之利用……则军国民教育之不能容于今日，可概见矣。”^③加之国内军阀混战对人们的观念造成巨大冲击，社会上抵制军国民教育的呼声不断。1919年，《教育杂志》刊文评论道：“现在欧战之后，军国民教育不合民本主义，已为世界所公认。我国教育宗旨，亦应顺世界潮流，有所变更。”^④同年10月，第五次全国教育会公开否定军国民主义，并通过《改革学校体育案》，规定减少兵操时间，增加体育课数。^⑤

192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学校系统改革案》。1923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公布《新学制课程标准》，废除了中小学的兵式体操课程，改“体操科”为“体育科”，确立了以田径、体操、球类运动等为主要内容的体育课程体系。^⑥体育正式取代军国民教育，进入全国学校的课程体系。此后，普通学校的军事训练一度停滞。1925年，在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教育联合会重新呼吁开展学生的军事训练，提出“小学及初中组织童子军，高中以上学生一律施行军训”的具体主张。不过，“由于全国教育联合会不是行政机

① 我一：《临时教育会议日记（1912年7月）》，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294页。

② 参见范源廉：《今日世界大战中之我国教育（1914年11月）》，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054~1055页。

③ 蔡元培：《欧战后之教育问题》，《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4月19日。

④ 《教育调查会第一次会议报告》，《教育杂志》1919年第5号，第19页。

⑤ 参见孙绪闻、费志杰：《浅谈清末民初军国民教育的变迁》，《海军工程大学学报》（综合版）2016年第2期，第44页。

⑥ 参见王华倬、郑沪娥：《我国近代壬戌学制与体育课程的改革背景、特点及其历史意义》，《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第509页。

构，其建议在全国虽曾发生相当的影响，但学校并没有一律实行”，^① 故而直至 1928 年，军国民教育始终未被恢复与重视。

（二）济南惨案与军国民教育的恢复

1928 年 5 月 3 日，日军以保护侨民为由，悍然侵占济南，残忍杀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战地政务委员兼外交处主任蔡公时及其随员 16 人，打死中国军民 6123 人，打伤 1700 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亦称济南惨案。济南惨案的发生，令举国上下激愤不已。5 月 7 日，正在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的中华民国大学院电令全国教育机关，于 5 月 7 日至 9 日的国耻纪念日讲授民族主义、日本研究、中日交涉史等“特种课程”，“使青年明白纪念国耻之真谛”。^②

5 月 10 日，缪序宾、潘剑啸、常罕如等为恢复军国民教育致电国民政府，他们认为：

此次日本出兵济南，惨杀同胞，悍然不顾公理，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惜破坏东亚和平之大局，以逞其军阀蛮横之野心，实行帝国主义侵略之政策，盖其处心积虑由来已久，非一朝一夕矣！概自欧战告终，西方诸国元气大伤，减军之议应运而生。日本阳则赞成减军，阴则积极扩张军备，海军也，航空军也，陆军也，无不着着猛进，观其历年预算，军费激增无已，便可恍然。

缪序宾等还指出，“日本政府一面既派遣陆军高级军官赴各中等以上学校实施军事教练，一面缩小限制大学生免除军役义务之范围，此种积极备战之政策，其目的究为何因，究为何事，明眼人自能知之”，只是“惜我国人昧于识见，犹做其和平之梦，一方讥日本为黠夫，一方又毫无预备，教育家更大力提倡其美国化的自然主义体育一科，遂以田径赛为主要之运动，苟有谈兵式操者，非嗤之以鼻，即讥为顽固耳。当我国各校废止兵式操之时，正日本各校猛力于军事训练之日”。缪序宾痛心疾首地表示，他在回国后曾多次与友人谈及“学校兵式操之不可废”，“而竟无一人与我同情者，甚至校中学生亦视我为不合时宜之主张，漠然若无所闻者”。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缪序宾等深感恢复并加强军国民教育已刻不容缓：

身体不健全，斯微生物乘之侵入矣；国民不健全，斯有今日日本之

^① 陈敬坤：《民国时期的学生军训》，《国防》1989 年第 5 期，第 31 页。

^② 参见王学珍主编：《北京高等教育纪事：1861 年—1949 年 1 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44 页。

横暴矣。今者国难已至，正我国民卧薪尝胆之日，亡羊补牢、未可云晚，拟恳钧委员会议交大学院通令全国所属各中等以上学校于最短期间一律增加兵操及军事训练一科，一面令知中央党部指导部及所属省县党部，指导民众组织团体受军事训练，俾全国国民均有军事上之常识。如此进可以作武装同志的后盾，退可以捍卫后方，防反动分子之扰动。^①

时任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也充分认识到恢复军国民教育的必要性，他回函称：

查敝院前以外侮日亟、非尚武不足以救国，经飭令全国专门以上学校加授军事教育、中等以下学校特别注意体育在案。此次全国教育会议，亦经议定实施军事训练具体方案，至详细办法一俟妥订后，即可通令实行。^②

同样是在5月10日，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等校50余人与京师大学校120余人在燕京大学举行代表会议，讨论济南惨案问题，并形成决议：组织“济案”后援会，积极向国内外宣传“济案”真相，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屠杀；5月14日停课一天；集款救济被难同胞；自5月14日至16日，每天上午6时和正午12时各击警钟一次，全体静默，为被惨杀的同袍哀悼。北京教育会亦在同一日召开会议，决定发表通电，要求南北息战，一致对日宣战。^③ 上述举措为军国民教育在爱国学生中重新受到重视奠定了思想基础。

不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提交《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育方案》《学术科教育要目表》《军事教育程度表》等军国民教育方案，在全国教育会议审议、修正后通过。^④ 5月22日，中华民国大学院通令“专门以上学校一律增加军事教育课，中等以下学校一律注重体育”。^⑤ 至此，在愈发危急的形势推动下，高中及以上学校开展军事训练的方案得以确定，并逐步付诸实施。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此前的军国民教育，这一时期高中及以上学校的军事

① 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239~1240页。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239页。

③ 参见王学珍主编：《北京高等教育纪事：1861年—1949年1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145页。

④ 参见陈建新：《民国时期学校军训史述略》，《民国档案》2003年第2期，第82页。

⑤ 王学珍主编：《北京高等教育纪事：1861年—1949年1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页。

训练被统一在国家的组织之下，除了强调尚武精神，还注重培养学生的军事素养。

四、结论

20世纪前期军国民教育思想的兴起与中国面对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屈辱历史密切相关：康有为主张“以民为兵”，促进了军国民教育思想的形成；留日学生蔡锷、蒋百里首倡军国民教育思想，为其后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梁启超著书立说，进一步发出唤醒国民尚武精神的呼声。在军国民教育思想的影响下，留日学生开始有组织地自发进行军事训练，清末新政也将培养尚武精神列为其教育宗旨之一。在民国初期，北洋政府继承和延续了清末的军国民教育，并取得一定成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专赖武力已被证明并不可取，随着“公理战胜强权”成为国人基本共识，军国民教育的热度锐减，直至1928年济南惨案爆发，军国民教育才再度为世人重视。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探索路径之一，军国民教育的思想与实践在本质上是为了自卫御侮，同德国、日本等国奉行的军国主义存在根本性区别。正因为如此，当中国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举国上下沉浸在世界公理大明的氛围中时，军国民教育随即受到了抵制与排斥，在短短几年内便被体育取代。这充分说明，军国民教育绝非不可替代的，只要条件允许，中国教育界和民众就更倾向于选择平和且符合自身文化传统的教育方式。只不过，济南惨案的残酷现实很快令中国人从幻梦中惊醒，他们认识到自己实则没有选择的余地，为了避免亡国灭种，必须在增强自身军事实力方面继续探索。于是乎，军国民教育作为一种救急措施又回归有识之士的视野。由此而言，20世纪前期的军国民教育对唤醒中华民族的危机意识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不仅呼应了中国古代府兵制和卫所制的历史传统，而且与近代西方的义务兵役制和全民皆兵主义颇为契合。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主动将“军人之智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领”融入学生的军事教育，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重文轻武传统，塑造了国民的尚武精神。

（责任编辑：张梦晗）